



从撒哈拉到好望角

▶ 裴广江

2009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十，我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开始作为人民日报驻外记者的生涯。

从奥利弗·坦博国际机场出来，碧空如洗，雨后的空气中弥漫着土腥味。除此之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随处可见的院墙上的铁丝网和大门旁的电子监控标识。此后的1400多个日夜，这座南非最大城市、著名的“黄金之城”，便是我在非洲的故乡了。

走进非洲，既有第一次出国工作的莫名兴奋，也有离开家人独自远行的彷徨无助。当记者，是自己多年来的梦想。这是一份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得最好的职业，是一旦拥有便令人无悔的职业。但到非洲工作，内心还是有些忐忑的。辞别一度非常不情愿我去非洲工作的父母，把怀孕几个月的爱人留在家，踏上去非洲的征途时，心情多少是复杂的。

非洲从不会辜负每一位怀揣梦想、不畏艰险的来访者。在非洲近4年，从撒哈拉沙漠到好望角，我一次次搜索自己的出差目的地，一次次奔赴未知的新闻现场，一次次用脚丈量非洲大地，一次次与朴实的非洲人民聊天。在非洲走过的那些路、见到的那些人、经历的那些事，早已装满行囊。我知道，非洲从此将永远与我相伴。

那些路

1886年发现黄金后，约翰内斯堡很快因“淘金热”从农场变成大城市，如今已有近400万人口。这里气候宜人，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南非当之无愧的“经济之都”。数条国道穿城而过，南非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非洲各地。

记者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职业，驻外记者更是如此。居住在约翰内斯堡北郊，我要负责报道的是东部和南部非洲的24个国家，北起吉布提，南至南非，东到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西迄大西洋岸边的刚果（金）。后来，我的报道范围又扩大到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这里，很快就习惯了一个人在一望无垠的旷野上开车疾驰，习惯了凌晨三四点写完稿、七点钟起床赶飞机，习惯了在陌生的国家早出晚归采访，习惯了把行李箱扔在地板上以方便出差时拎起就走。

非洲的路在脚下延伸。南非120多万平方公里山川，有平坦，有险峻，有雄伟，有秀美。所到之处，到处风光怡人。汽车刚才还在东开普省的狂野海岸边，一会儿就会不知不觉中驶上数百米高的半山腰。南非的空气极其透亮，在高速路上远远望见一座看似近在咫尺的山头，有时竟要飞驰上一个小时才能到山脚下。南非全国9个省，很多大小城镇都值得探索。有时汽车驶上一个山坡，会发现眼前有一个偌大的城市在等着你。行车到暮色降临，随便

裴广江，人民日报主任记者。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年2月至2012年12月，任人民日报社南非分社、非洲中心分社记者。致力于从非洲人的视角报道非洲，足迹遍及十几个非洲国家。曾乘火车走完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亚吉铁路全程，曾深入苏丹达尔富尔、南非祖鲁村、肯尼亚达布难民营采访。



2011年7月29日，达达布难民营中的孩子们。裴广江摄

拐进一个小镇，就能在路旁找到一家不亚于城市中星级酒店的家庭旅馆。如果服务人员已下班，老板会毫不犹豫亲自下厨，并拿出红酒与客人一起品尝。

在路上，有苦也有甜。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的路程是漫长的。

“乞力马扎罗”号列车以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的速度穿越东非大裂谷，深夜在一个小城市也可能停上3个小时，把乘客交给蚊子。那中国生产的内燃机车，坚毅地从一个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字样的轨枕上驶过。经过57个小时的旅行，终于在午夜看到达累斯萨拉姆的灯光，

就像在大洋中长久漂泊后看到陆地一样兴奋。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到距离索马里边境几十公里的世界最大难民营——达达布难民营的路是艰险的。由于长时间干旱，路上的沙土足有10厘米厚，越野车也要打滑，联合国难民署提醒沿途可能还有武装分子袭击，令人心有余悸。

那些人

短暂地与同事交接工作后，就是令人难耐的冷清寂寞。送走同事的那个上午，面对空空荡荡的大房子，我一个人在楼下呆坐了足足几十分钟。

第二天早上，在小区内跑步，偶尔一位黑人保姆打开一栋精致别墅的木门，那一声“早上好”足以令人激动不已。晚上，值夜班的小区保安便是我的聊天对象。打扫卫生时，来自夸祖鲁—纳塔尔省的那位黑人阿姨，被我缠着聊个没完。正是这位当时五六十岁的阿姨，准确地预见到雅各布·祖马那年4月将当选总统，之后接替他的将是西里尔·拉马福萨。开车将从市中心请来的清洁工送到小区门口时，她的一句话令人难忘：“你们中国传统文化保存得很好，这样的国家是一定能够强大起来的。”负责维护



2009年4月19日，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非国大竞选集会上。裴广江摄



2011年2月11日，两名南非女孩在约翰内斯堡参加中国春节庙会。裴广江摄

草坪的白人老板迈克每周准时开车把工人送到，时常一边写着当月的账单，一边唠叨着工人如何难管理、生意如何不好做。维修电脑的那位白人小哥，虽然每次上门费都要几百兰特，有时还会稀里糊涂带错你需要的零件，但他偶尔来一次，却会告诉你自己前一阵子被歹徒用枪射伤的惊人消息。附近加油站的工人，无论是南非还是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的，见面总会大声喊声“兄

弟”。

新南非成立于1994年，如今仍走在漫长的追求经济解放的道路上。在约翰内斯堡西南部的贫民区索韦托，距离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故居和如山一样堆积着的金矿渣不远，一群黑人朋友靠从下水道的污泥中拣拾贵重金属物品为生，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在水流湍急的下水道中闭气往返数米。“这个国家有很多人在努力找工作，”他们

中一位叫西贝西索的说，“只要大家能找到一个机会，并像我们这样工作，就能活下去”！在印度洋暖风吹拂的夸祖鲁—纳塔尔省祖鲁人村落，不少人家的房子四处漏风，厨房中的食物吃了这顿没下顿，孩子们空着肚子上课，等待学校提供的免费午餐。失业在家的汉密尔顿·祖马组织起“超级射手”足球队，带领无业青年每天坚持训练。中学副校长穆奇泽说：“教育就像是一把钥匙，如果接受了教育就能打开很多很多扇门。”北开普省奥兰治河畔的白人小镇奥拉尼亚，仍坚持发行自己的货币，坚守着只允许白人居住的传统。年近五旬的镇长小卡尔·波绍夫说：“建立奥拉尼亚是出于一个政治理念，即让这里成为阿非利卡人生存并能独立做决定的地方，成为能保存我们文化的地方。”

在非洲，中国人从来不缺朋友。当我在坦赞铁路赞比亚始发站卡皮里姆波希火车站门口张望时，热情的伯纳德·西穆恩塔拉站长把我请到办公室，并介绍一个又一个采访对象。他帮我把行李提到卧铺车厢，并在自己到达目的地前专门来跟我道别。虽然到北京接受培训已过去30多年，但坦赞铁路局退休工程师杰夫·纳姆恩德仍能清晰地读出名片上的“人民日报”四个字。他说：“坦赞铁路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热爱这条铁路。”在达达布难民营

低矮的帐篷中，索马里难民穆斯林玛不顾全家刚安顿下来、孩子们仍缺吃少喝，执意给我沏了一杯奶茶。难民们听说我来自中国，热切地诉说中国当年帮助索马里建体育场、中国医疗队帮助当地人的故事。

那些事

2009年，纳尔逊·曼德拉已经91岁，不接受媒体采访已有5年。但无论是在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竞选集会上，雅各布·祖马总统的就职典礼上，他的出现总会引起轰动。2010年南非世界杯，他能否出席开幕式还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从罗本岛监狱到比勒陀利亚联邦宫，他带领南非走过漫漫自由路，成为南非实现种族和解的精神领袖。为表彰他对和平文化与自由的贡献，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7月18日定为“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无论是在非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和解精神都是人类和平相处不可或缺的。

曾上演过“黑鹰坠落”的索马里，那几年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海盗。北起亚丁湾，南至莫桑比克海峡，海盗似乎无处不在。2009年4月，海盗在距离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东北约650公里的水域劫持了一艘丹麦货船，船上有21名美国船员，一时引起轰动。近些年海盗活动逐渐减少，除了多国海上护航外，关键在于非洲联盟（非盟）派驻维和部队，一定程度上稳住了索马里国内局势。



坦赞铁路上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制”的轨枕。裴广江摄

索马里真正的问题在于部族矛盾，解决问题首先要实现政治和解。

非盟首脑会议是非洲国家领导人擘画非洲大陆发展愿景、对外发出统一的非洲声音的重要平台。2010年1月底，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开幕的第十四届非盟首脑会议上，非盟升起有53颗星的新会旗，代表非盟53个成员紧紧团结在一起。在那一届非盟首脑会议上，时任非盟轮值主席、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身穿白色长袍，侃侃而谈。非洲国家领导人所推动的，是整个非洲的联合自强、发展振兴。泛非主义是非洲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是非洲推进政治经济联合和一体化进程的旗帜。

2012年，卢旺达的“加查查法庭”正式退出历史舞台。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后，这个非洲中部小国的司法体系遭到彻底破坏，几十万犯罪

嫌疑人关在狱中得不到审判，数以万计受害者家庭得不到补偿。如果采用常规司法手段，至少要上百年才能审理完全部案件。卢旺达启用本国传统的“草地上的司法审判”，从2002年6月起成立了12万多个传统法庭，雇用了16万多名民间法官，在10年内审理了近200万起案件。这种法庭的要旨不在于惩罚，而在于和解。那些对“加查查法庭”法庭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人没有为卢旺达找到答案，发生过种族大屠杀这样巨大灾难的国家，却从本国传统中找到了答案。这就是非洲人的智慧。

虽然前行之路充满艰辛和磨难，但非洲始终坚韧不屈。作为人类的起源地，非洲有足够的智慧，能够靠自己的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要尊重非洲，让非洲成为非洲。🍷